

管子“天下才”的历史书写与文化意蕴探析

张艳丽

(山东理工大学《管子学刊》编辑部, 山东 淄博 255000)

摘要:春秋时期政治家管子被称为“天下才”,后世文人运用诗歌、史论、小说等不同古典文学体裁,对其治国才能及爱国护民的家国情怀进行阐释,展示了管子人才形象强大的历史感召力,也是国家发展艰难之时的期望和理想寄托,更能在与西方文化的对比、交流中期增强民族自信。学史增信,管子“天下才”的多维历史书写,为记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恰当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供更好的视角,值得深入探讨。

关键词:“天下才”;管子;学史增信

中图分类号:G127;B2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7-0625(2024)03-0001-05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提出:“要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1]贯穿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的思想理念、人文精神,持续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壮大提供精神支撑。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历史上涌现出众多的人才,对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起到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其中,春秋时期的管仲被世人称为“天下才”,是治世人才中的佼佼者,其功绩被后代文人反复提及,赋予厚重的文化内涵,值得探讨。

管仲名夷吾,字仲,谥敬,管子是世人对管仲的尊称。作为春秋时期齐国政治家、思想家,管子辅佐齐桓公,在齐国大兴改革,对内整顿行政管理系统,“叁其国而伍其鄙”;经济方面施行“官山海”盐铁专卖,提出“相地而衰征”的土地管理政策;军事方面“作内政而寄军令”,社会发展与军事相结合,逐渐实现富国强兵;外交方面高举“尊王攘夷”的旗帜,挟天子以伐不敬,逐渐成为诸侯国霸主,又联合中原势力抵抗外来民族的攻击,维护文化传统^[2]。在齐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管子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而在历代文人的历史记忆中,管子的治国才能可圈可点,管子“天下才”的定位为大多数士人所接受,频繁提及并进行分析,

成为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

一、先秦典籍对管子“天下才”的记载

管子的治国才能与治世才能为世人所瞩目。先秦典籍中除记载管子的史事与功业外,史学家还通过当时人物的评价,或史臣评价,对管子有号称天下之人才的定位。如成书较早的《国语》记载,齐桓公小白争夺齐国君位成功,要求鲁国把辅佐公子纠的管子送回齐国,鲁庄公向大夫施伯咨询是否把管子送还齐国,《国语·齐语》记载:施伯对曰:“此非欲戮之也,欲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国,则必得志于天下。令彼在齐,则必长为鲁国忧矣。”^[3]在此,施伯不同意把管子送归齐国,对鲁庄公分析说:管子具备治理天下的才能,管子的才能天下皆知。齐国把管子索要回去,必定不会杀他,而是要重用他,这样会影响今后鲁国的发展。施伯较早对管子有“天下之才”的评价,而此时管子辅佐齐桓公的治国才能还没有展示出来,可见管子的才能已声名在外。

在《管子·大匡》中,也记载有相同的事件,只是记载的内容差别较大。鲁庄公咨询施伯能否把管子送还齐国,施伯曰:“君与之!臣闻齐君惕而亟骄,虽得贤,庸必能用之乎?及齐君之能用之也,管子之事济也。夫管仲,天下之大圣也,今彼返齐,天下皆乡之,岂独鲁乎!今若杀之,此鲍叔之友也,鲍叔因此以

收稿日期:2024-05-14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稷下学派文献整理与数据库建设研究”(项目编号:19JZD011)

作者简介:张艳丽(1978—),女,山东济宁人,副编审。研究方向:齐鲁地方文化。

作难,君必不能待也,不如与之。”^[4]在《管子》的记载中,施伯是同意把管子送归齐国的,认为齐国不会真正重用管子,并且认为如果拒绝齐国索要管子的请求,可能会引发齐鲁两国的矛盾和战争。施伯于此处认为管子为“天下之大圣也”,对管子的治国才能高度认可。

而儒家典籍《论语》记载了孔子对管子的评价,《宪问》篇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5]又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5]154}这反映出春秋末期管子除使齐国兵强民富以外,在华夏文化发展的过程中也做出了特殊贡献。虽则孔子对管子评价很高,对其联合诸侯、维护中原地区和平的功劳毫不讳言,但孔子并没有把管子看作是圣人。这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管子·大匡》中施伯对管子“天下之大圣也”评价记载的流传度。当然,后世对《管子》文本的怀疑和辨伪,也消弭了世人对这一记载的接受心理。孔子的这些评价结论影响极大到后世士人对管子的定位,管子由此注定不可能被儒家看作是圣人。

二、古代诗歌对管子“天下才”的吟诵

诗歌是古代一种主要的文学体裁,讲究韵律,读来朗朗上口,可用较少字数表达对文化现象或历史人物的认知和点评。西晋文学家夏侯湛写有《管仲像赞》,其曰:“堂堂管生,忘存兴仁。仁道在己,唯患无身。苞辱远害,思济彝伦。心寄鲍子,动成生民。”^[6]较早以诗歌的方式对管子的事迹和功业进行吟诵。夏侯湛认为,管子注重仁道,拯救民众于水火之中,于百姓有大的功勋。

明代文人黄道周在老家漳浦石养山设置“十朋轩”与“九串阁”,列 56 贤牌位。其中“十朋轩”排列管子、郑子产、吴公子季札、董仲舒、诸葛亮等 26 位贤士能臣,以管子居首;“九串阁”以屈原为首,列 30 位历史名人。每位历史人物都写有赞语,其中《管仲赞语》曰:“时不可王,道从其朔。望氏之绪,虽旦不复。为才人君,为文人师。德成智出,万物果得,千世寡匹。”^[7]认为管子德治双全,治国才能与治理思想无人匹敌。

值得注意的是,在吟诵管子的诗歌中,很多文人对管子“天下才”的定位鲜明,在所作诗句屡屡提及,这进一步扩展了管子天下之人才的历史定位和影响力。清代诗人舒位作《读〈论语〉诗六十首》,第六首是

关于管子的,其曰:“管子天下才,春秋无与比。惜遇齐桓公,不过中主耳。赫赫开霸图,厥功伟且驶。若欲王齐国,将夺周天子。赖其戴虚文,迁延八百祀。所以拜胙生,终胜请隧死。此岂桓能为,必是仲所使。大醇而小疵,器小不知礼。孟子论过高,五尺称羞耻。岂知微管叹,孔门有深旨。魏征田舍翁,迹类管仲是。乃百齐桓公,敌一唐太宗。”^[8]诗歌以《论语》记载的管子事迹为中心,描述了孔子、孟子对管子的评价,阐述儒家对管子的综合定位。诗中开篇即点明,管子是天下尽知的人才,春秋时期的历史人物虽多,若过江之鲫,但能够与管子的才能相提并论的,几乎没有。齐桓公之所以能够取得辉煌的治国功勋,与管子的治国能力与尽心辅佐是分不开的。

也有诗人总结认为,管子治理天下的才能,体现在经济思想、执政理念、九合诸侯及著书立说等诸多方面。清代毕沅作诗《读诸子诗十八首·管子》曰:“夷吾天下才,经济善率育。观其任政后,好恶同于俗。转败以成功,因祸而为福。《牧民》《乘马》篇,不厌屡反复。三归虽太奢,九合究堪录。”^[9]这与太史公司马迁对管子的认识类似。司马迁为管子立传《管晏列传》,阐述管子的治国理念曰:“管仲既任政相齐,以区区之齐在海滨,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10]司马迁对管子也予以极高的评价。

可见,古代诗人们对管子治理天下的才能形成共识,赞不绝口,在诗歌创作中屡屡提及,使管子“天下才”的人物形象深入人心。文人们一致认为,管子的治国思想和才能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清末民初诗人林大椿作《管夷吾(管仲)》曰:“堂阜囚人天下才,槛车远送相臣来。从容谈笑安中国,八百年中见几回?汉魏经生事业墟,宋元理学或拘虚。通儒只有王新建,可毁《山高》《乘马》书。”^[11]指出管子护国保民,使百姓安居乐业,整个周代 800 多年的时间里无人能比,而在汉魏宋元时期的影响力也不可忽视。

三、历代史论对管子“天下才”的认识

除以诗歌大力吟诵管子“天下才”之外,文人们还通过史论、政论的撰写,来褒扬管子的功业。明代学者吴讷曰:“按《韵书》:论者,议也。梁昭明《文选》所载,论有二体:一曰史论,乃史臣于传末作论议,以断其人之善恶,若司马迁之论项籍、商鞅是也;二曰政论,则学士大夫议论古今时世人物,或评经史之言,正

其讹谬,如贾生之论秦过,江统之论徙戎,柳子厚之论守道、守官是也。”^[12]后世文人撰写的关于点评管仲、《管子》的文稿中,有对管子“天下才”的分析。

明人王心一作《管仲》,直接点明管子是治理天下的人才:“管仲天下才,惜乎遇非其主,以桓多内宠,非能用管仲者。若无仲,则亦襄公之续耳。惟仲善用,桓不一一与之争,而第因之以立功名,故一匡九合。”^[13]清人纳兰常安《读〈管子〉》开篇也曰:“管仲夷吾,固所称天下才也。迹其相桓公,尊周室,攘夷狄,一匡天下,以其君霸,功实巨焉。”^[14]文人们毫不讳言对管子“天下才”的评价和定位。

《管子》典籍的编著,是管子治理天下才能的体现。清人严辰作《管仲论》,明确指出管子是治理天下之才,并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及管子的治国举措进行详细分析:“盖自周辙既东,王纲下替,荆楚僭号,戎狄凭陵,方伯连帅不能举其职。齐桓一中主耳,得仲为相,而一匡九合,尊周攘楚,天下翕然宗之。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圣人之推崇,至于此极,而群弟子顾犹以不死少之。然则仲之为仲,其诸功在天下,而过止一身者乎!今世所传《管子》八十六篇,虽多为好事者所加,而其中《山高》《牧民》《乘马》诸篇,致国富强之道大略可睹,固非天下之才,不能成天下之功也。”^[15]管子功在天下,《管子》一书的编著,虽然多为“好事者”为之,并非全部由管子编订。但不可否认,其中一些篇章记载管子的治国措施,这也是管子“天下才”的体现。

管子治理天下的才能,体现在与其他诸侯国的对比之中。缪晋作《管仲论》曰:“夫管仲,天下才也。”管子的功业,主要体现在辅佐齐桓公治理齐国方面:“纲举目张,始则作内政,寄军令,官山府海,致其国于富强;继则城楚邱,迁夷仪,怀远招携,导其君于德礼。虽其间未尝无侵伐,而其大旨则在于尊周攘楚,而无穷兵黩武之心。故齐桓之举动,光明凛凛于天威,咫尺以视。晋文、楚庄、秦穆诸人,不可同日而语。大约管仲之力居多。”与同时期的晋国、楚国、秦国相比较而言,齐国国富民强,国力明显高于其他国家。同时,在齐桓公与管子君臣的共同努力之下,管子的治国才能展露无遗:“千古创霸之局于此而开,千古佐霸之才亦于斯为最。”^[16]管子治理天下的才能被反复提及,多次强调。

有的文人把管子与其他时代的历史人物进行对

比,对比的标准依旧在“天下才”方面。清人高建章《管仲贾谊》分析曰:“管仲天下才,贾谊亦天下才。管仲内政之作,徒尚霸功;贾谊治安之策,实本王道,使其见诸施行,汉家制度未必不可进于三代也。乃管仲遇英主而计得行,功高天下;贾谊遇英主而道不用,身谪外藩。”^[17]指出管子与贾谊都是天下知名的人才,应时代需求而生,对春秋时期的齐国和西汉时期的治理做出重大贡献。

清人严首升总结对比评价说:“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名卿大夫如猬毛,皆国土也,独管子称天下才。战国继之二百四十五年,鲁仲连为天下士。或出或处,并立天地,仲连未始无用,管氏未始疚心,各有以自见,各有以自处。”^[18]明白无误地指出,春秋时期虽然史书中记载的人物众多,功勋各异,但只有管子能够称为天下之才,其他的人都不足以获此称号。

在此认知的基础上,晚清时期的梁启超给予管子极高的评价。梁启超《管子传》中认为,管子是伟大的政治家与伟大政治学者的合体,在此方面中国历史上无人能及,其曰:“管子者,中国之最大政治家,而亦学术思想界一巨子也。顾吾国人数千年来崇拜管子者,不少概见。”梁启超把管子的治国思想,与宋代王安石进行类比,高度褒扬管子:“其以伟大之政治家而兼为伟大之政治学者,求诸吾国,得两人焉:于后则有王荆公,于前则有管子。此我国足以自豪于世界者也!而政治学者之管子,其博大非荆公所能及;政治家之管子,其成功亦非荆公所能及。故管子调乎远矣!”^[19]这可谓是对管子“天下才”认知的综合反映和集中体现。

四、管子“天下才”历史书写的文化意义

由上述分析可知,历代文人对管子“天下才”的评价和定位,主要出现在清代。出现这种文化现象的原因,一方面与清代距离当今时代较近,保存史料较多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明末清初“列国”小说的较多出版与传播有关。明末清初之际,列国小说出现较多,一些讲述管子历史故事的小说中,对管子的治国才能进行描述,借助鲁国大夫施伯之口,夯实了管子“天下才”的定位。

如明代冯梦龙《东周列国志》记载:施伯私谓鲁庄公曰:“臣观管子之容,似有内援,必将不死。此人天下奇才,若不死,必大用于齐。大用于齐,必霸天下,鲁自此奉奔走矣。君不如请于齐而生之。管子生,则

必德我。德我而为我用，齐不足虑也。”^[20]而清代文人吕抚编辑《二十四史通俗演义》中，《齐桓公，晋重耳，五霸称尊》篇描述了齐桓公称霸诸侯的过程，其中提到，施伯对曰：“管子，天下才也，所在国，必得志，请杀而以其尸授之。”^[21]这些明清时期“列国”小说对管子治理天下才能的反复记载，及当时民众对小说等俗文化的普遍接受，一定程度上促使清代文人脑海中留下管子“天下才”的文化印痕。

毋庸讳言，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管子占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管子“天下才”的文化形象活跃在文人们的记忆中，这包含丰富的文化意蕴，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其一，管子辅佐齐桓公治理齐国和尊王攘夷的功绩人所共睹，这是历史的真实存在，管子被视为“天下才”。管子的人物形象被后人追崇，这既是国人“崇古”心态的反映，也是英雄情结的体现。管子的存在与历史功绩，是值得骄傲的情感资本，是引以为自豪的文化源泉，是栖息家园的精神风貌。耿振东分析认为管子形象的历史感召力，认为他是一位有创新意识的政治改革家，一位坚定的爱国志士，一位被人敬仰的民族英雄^[22]。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才的爱国情怀，指出：“鼓励人才深怀爱国之心、砥砺报国之志，主动担负起时代赋予的使命责任。广大人才要继承和发扬老一辈科学家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优秀品质，心怀‘国之大者’，为国分忧、为国解难、为国尽责。”^[23]人才必须是具备高尚情操的人才，是以天下为己任的人才。后世学者在辨析管子“天下才”时，都有自己明确的论述目的，这展示出知识分子爱国护民的真切情怀，以及儒者的责任、使命和担当。

其二，管子“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尊王攘夷”，维护华夏民族的主体文化，拯救华夏文化于危难之中，是国家发展艰难之时的期望和理想寄托所在。生活于明朝中期的王世贞，当明王朝面临南有倭寇滋乱，北有瓦剌、鞑靼在边境烧杀掳掠的侵扰，国家边境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时，就大声疾呼如同管子之治国才能的人物出现，以担负起抗击边患、保境安民的艰巨使命。王世贞《读〈管子〉》曰：“昔宋之南压于金，若卵矣，而濂闽之徒，日谆谆以正心诚意之说告其君。至于用略焉，万一不幸而君任之，井吾田，车吾兵，不踰时而社稷饱敌矣。呜呼！今安得起仲而将相其才，使之南治岛，北却敌，徐而置濂洛诸儒于庠序间，雅步高

论，藻饰其所不足耶？”^[24]在危难存亡之际，士人们把维护国家安全的希望，寄托于类似管子之类的人才。管子已然成为民族复兴、国家强盛的一位精神领袖，他应和时代的呼唤，号召和鼓舞着人们保家卫国，奋勇向前。

其三，管子经国方略重在解决具体且现实的国家治理问题，西学东渐之后，一些国人赫然发现，其与西方治国方略有相似之处，而这种认知促使国人在心理上更容易理解、接受这些西方的“实用”思想。薛福成是近代著名的外交家，曾代表清政府出使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等国家。在接触了西方的相关文化之后，薛福成认为，欧洲国家的强盛，与其治国政策有密切关系，而这些治国策略与《管子》记载的内容相契合。薛福成在出使日记中明确指出：“《管子》一书，以富国强兵为宗旨，然其时去三代未远，其言之粹者，非尽失先王遗意也。余观泰西各邦治国之法，或暗合《管子》之旨，则其擅强盛之势，亦较多。”具体而言，可从政治、军事、工商等方面进行类比。如薛福成分析说：“《管子》云：‘量民力则无不成，不强民以其所恶则诈伪不生，不欺其民则下亲其上。’西国之设上下议院，颇得此意。又云：‘事者生于虑，成于务，不虑则不生，不务则不成。’西国各学之重专家，各业之有公司，颇得此意。”^[25]后来，薛福成又继续强调说：“余谓：西人不过略师管子之意，而推广之。治术如是，学术亦如是，宜其骤致富强也。”^[26]虽然这种说法一定程度上显示出薛福成的主观认识偏见，略微夸大了管子治国思想的功用，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提法和认知的普及，使得国人接触到西方思想时不至于太过茫然。管子思想与西方思想的类比，极大打破了中西方文化之间的交流壁垒。

其四，管子治国思想丰富而经世致用，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诸多方面处于弱势地位，而学人们力图把管子思想与欧美思想进行对比，以期增强民族自信，在与西方文化的交流中获得认可感。晚清宋康复《管仲为政四民不使杂处论》分析管子的“四民分业”国策时曰：“乌虚，斯言也，何其与斯密氏分功之言类也！……且斯密言计学，尚昧于通力合作之义，而管子独能拳拳于群萃州处，相语相示，以为分功之效之大原则，其识尤为斯密所未及。伟哉，管子！举近日欧美国家所遵奉，学子所推崇之学说，乃于二千余年，已能冥合之，实行之，此其所以为天下才，而齐之所以霸

欤！顾吾尝因斯密旁见之言，以证管子之政略。”^[27]民族自信心是一个民族肯定的、积极的自我认识和自我评价，管子治国思想是中西文化交流中国人汲取民族自信心的重要文化资源。当代社会中，创新性地发掘管子思想，更是新时代赋予的使命和重任。

要之，管子的治国才能和功勋，后世文人在诗歌和评论中多有关关注和阐述，管子本人被冠以“天下才”的称谓，在评价管子的时候反复提及和详细分析。这

是世人的一种共识，是对管子人物形象和精神符号的高度认可。在此认知基础上，管子俨然化身为历史发展中的一面鲜艳旗帜，感召着人们为国家繁荣、民族富强而努力奋斗。管子形象即是在这些价值的关注中被探讨与再现^[28]。从学史增信角度来看，为了更好地增强和坚定民族自信，管子文化值得进一步挖掘和创新。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J]. 求是, 2021(13): 4.
- [2] 李玉洁. 齐国史[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7: 122-128.
- [3] 左丘明. 国语[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147.
- [4] 赵守正. 管子注译: 上[M].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2: 166-167.
- [5] 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4: 154.
- [6] 严可均. 全晋文: 中[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726.
- [7] 郑晨寅. 依违于仁义与功利之间: 论明末大儒黄道周对管仲的接受之变迁[J]. 管子学刊, 2012(3): 24.
- [8] 舒位. 瓶水斋诗集[M]//清代诗文集汇编: 第 479 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116.
- [9] 毕沅. 灵岩山人诗集[M]//清代诗文集汇编: 第 369 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461.
- [10]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2136.
- [11] 林大椿. 林大椿集[M]. 北京: 线装书局, 2013: 127.
- [12] 吴讷. 文章辨体序说[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2: 43.
- [13] 王心一. 兰雪堂集: 卷四[M]//四库禁止毁书丛刊: 第 105 册.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97: 572.
- [14] 纳兰常安. 受宜堂集[M]//清代诗文集汇编: 第 255 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417.
- [15] 严辰. 墨花吟馆文钞[M]//清代诗文集汇编: 第 689 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491.
- [16] 缪晋. 缪寄庵文稿[M]//清代诗文集汇编: 第 411 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683.
- [17] 高建章. 左史比事注译: 下[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238.
- [18] 严首升. 濂园诗文集: 卷二十五[M]. 修本. 1657(清顺治十四年).
- [19] 梁启超. 梁启超全集: 第 3 册[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99: 1859.
- [20] 冯梦龙. 东周列国志[M]. 长沙: 岳麓书社, 2018: 100.
- [21] 吕抚. 二十四史通俗演义[M]. 北京: 中国书店, 1993: 55.
- [22] 耿振东. 《管子》学史[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8: 1007-1013.
- [23] 新华社. 习近平出席中央人才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EB/OL].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2021-09-28)[2024-03-14]. https://www.gov.cn/xinwen/2021-09/28/content_5639868.htm.
- [24] 王世贞. 弇州四部稿[M]//文渊阁四库全书: 第 1280 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760.
- [25] 薛福成. 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日记[M]. 北京: 中国旅游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2016: 140.
- [26] 薛福成. 庸庵随笔[M].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8: 62.
- [27] 顾廷龙. 清代朱卷集成: 第 321 册[M]. 台北: 台湾成文出版社, 1992: 157-161.
- [28] 游森. 论管仲形象的政治伦理意义: 以朱子《论语集注》中对管仲的评价为中心[J]. 管子学刊, 2020(4): 79.

Historical Writing and Cultural Implication About Guanzi as “A Talent of the World”

ZHANG Yanli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Guanzi Journal,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ibo Shandong 255000,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the politician Guanzi was known as “a talent of the world”. Later literati used different classical literary genres such as poetry, historical theory, and novels to analyze his governing ability and patriotic patriotism, demonstrating the strong historical appeal of Guanzi’s talent. It was also an expectation and ideal support for the country’s development in difficult times, and could enhance national confidence in comparison and exchange with the western culture. Studying history enhances conviction, and the multidimensional historical writing of “governing the world’s talents” provides a better perspective for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memory and inheritance of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which is worth exploring in depth.

Keywords: “a talent of the world”; Guanzi; studying history to enhance conviction

[责任编辑 夏强]

(上接第 83 页)

Modern Transformation in the Text and Stage Performance of Sizhou Opera’s “San Juan Han Qiao” During the “Seventeen Years” Period

WANG Kui, WANG Jinglong

(School of Arts, Anhui University, Hefei Anhui 230011, China)

Abstract: “San Juan Han Qiao” is a representative traditional play of Sizhou Opera. During the “Seventeen Years” period of drama reform, it was adapted and created by the Anhui drama worker Wan Yizhou based on the oral narration “Xiao Qi Tian” the old Sizhou Opera artist Wei Yulin. Firstly, the adapted version excised and revised the dross content related to feudal superstition and class oppression in the oral narration, thereby highlighting its people-oriented nature and comple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play from folk art to people’s art. Secondly, to meet the needs of Sizhou Opera’s transition from rural stages to urban theaters, “San Juan Han Qiao” discarded the casual pattern design and derogatory performance techniques found in the oral narration, and actively employed the act system of modern theaters, marking a successful practice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Sizhou Opera’s stage art. “San Juan Han Qiao” has provided a model for the reform of Sizhou Opera and other opera genres, and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later transplantation of Shangluo Huagu Opera’s “Tu Fu Zhuang Yuan.”

Keywords: drama reform; Seventeen Years; Sizhou opera; “Xiao Qi Tian”; “San Juan Han Qiao”

[责任编辑 夏强]